
论文题目：纳税助企：来自增值税发票改革的经验证据

所属领域：财政与公共经济学

摘要：一直以来，纳税与税收征管是企业与政府之间长期博弈的结果，政府的征税努力往往以牺牲企业的利益为代价，鲜有文献关注到企业自身存在主动纳税的需求。基于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发票的改革事实，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增值税制度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发现在考虑到增值税征管差异时，自开发票制度会增加小微企业的利润和收入，进而导致企业进入门槛降低，吸引更多企业进入市场。与预测一致，本文利用家庭和城市层面的两套数据，表明自开发票政策显著提高小微企业的经营绩效，表现为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提高，同时也提高了企业的纳税遵从。本文对其潜在的机制分析发现，自开发票政策通过减少纳税遵从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缓解现金流压力三条渠道促进小微企业发展。自开发票政策导致企业进入门槛的降低和企业的市场进入，同时，更年轻的创业者选择主动创业，且更趋于正规化创业。

关键词：增值税改革 小微企业 纳税遵从 企业进入

纳税助企：来自增值税发票改革的经验证据

内容摘要：一直以来，纳税（遵从或不遵从）与税收征管是纳税企业与政府之间长期博弈的结果，政府的征税努力往往以牺牲企业的利益为代价，鲜有文献关注到企业自身可能存在主动纳税的需求。基于中国 2016 年开始的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发票的纳税征管改革的事实，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增值税制度的异质性企业模型来分析自开发票政策对企业生产经营以及市场进入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在考虑到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税收征管差异时，自开发票制度会增加小微企业的利润和收入，进而导致企业进入门槛降低，吸引更多企业进入市场。与预测一致，本文将家庭层面和城市层面的两套数据结合起来，表明自开发票政策显著提高了小规模企业的经营绩效，表现为企业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提高。同时也提高了小规模企业的纳税遵从，表现为纳税概率、纳税金额、实际税负的提高。本文对其潜在的机制分析发现，小规模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既有纳税监管的作用，也有真实增加了企业经营活动的作用，具体来说，自开发票政策通过减少企业纳税遵从成本，提高企业在上游市场竞争力，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三条渠道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本文还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自开发票政策在家庭层面和城市层面均导致了企业门槛的降低和企业的市场进入，出现了扩展边际效应，同时，更年轻的创业者选择主动创业，且更趋于正规化创业。

关键词： 增值税改革 小微企业 纳税遵从 企业进入

一、引言

税收通常被认为是企业的负担¹。企业会采取各种避税和逃税的方式来降低这种负担（高培勇，2006；Bird et al., 2008；Naritomi, 2015）。政府为了扶持企业的发展，也会通过下调税率、减免税基等方式来帮助企业降低税收负担（Liu et al., 2017；冯海波和陆倩倩，2020；王业斌和许雪芳，2019；甘犁等，2019；王伟同等，2020；冯俊诚，2022）。而税务部门的征税努力，则往往会因为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而损害企业的发展（张克中等，2020；田彬彬等，2021；李昊楠等，2021）。

但是，很少有研究注意到，企业自身可能存在主动纳税的需求，尤其是在增值税体系下。增值税由于抵扣制度形成了独特的自我征管机制（self-enforcement），成为发展中国家普遍

¹ 税收负担（tax incidence）这一概念深刻地反映了这种想法。

采用的一种商品税形式。在增值税体系下，下游买方企业希望上游卖方企业能够提供用于进项税额抵扣的增值税发票，这为税收征管提供了第三方信息，并造成了买卖双方合谋激励的不对等（Gordon and Li, 2009; Kleven et al., 2011; Kumler & Frias, 2013; Pomeranz, 2015; 田彬彬, 2021）。买方的发票需求，实际上为卖方发票纳税提供了监管，降低了政府的征税成本。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买方企业存在着发票需求，那些能够开具增值税抵扣发票²的企业更容易受到买方企业的青睐。这时，为了满足买方企业的需求，扩展商品销路，卖方企业就存在主动开具发票并缴纳增值税的激励。

本文利用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发票试点政策提供的准自然实验来研究增值税体系下企业的纳税需求。由于小微企业账目管理能力差，税制规定小规模纳税人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当需要专票时，去当地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发票³。“营改增”之后，绝大多数客户要求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随着金税三期工程推进带来国家治税能力提升，也出于让小微企业享受到“营改增”减税红利以及深入推进税务系统“放管服”的目的，中国在2016年8月在住宿业推出了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发票政策（下文简称自开发票政策），并在行业逐步推开。该政策允许小微企业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率与增值税普通发票的一样，按照3%和5%的征收率。截至2017年3月，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发票试点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全国共有约4万户住宿业小规模纳税人自行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160多万份⁴。自开发票政策会从以下渠道对小规模纳税人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首先，自开发票政策减少了企业的纳税遵从成本，纳税遵从成本是指纳税人在缴税付出的额外成本。代开增值税发票，需要小规模纳税人进行代理记账或者频繁往返于税务部门之间，自开发票减轻了企业的纳税遵从成本。其次，自开增值税发票对于下游企业来说具有明显的“减税效应”，上游的小规模纳税人相比于上游的一般纳税人对下游的一般纳税人来说成本更高，因为其不能及时顺利地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而导致上游的小规模纳税人“折价销售”或者订单减少。自开发票政策使得上游的小规模纳税人与一般纳税人具有同等的销售环境，更加便利快捷地开具增值税发票能够促进企业更多地进入产业链，增加其在上游的市场

² 1994年颁布的《增值税暂行条例》，把企业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一般纳税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用于进项税额抵扣。而小规模纳税人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不能用于进项税额抵扣。

³ 企业需要以下几个步骤代开增值税专票：在办税服务厅指定窗口提交以下材料，《代开增值税发票缴纳税款申报单》；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或税务登记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经办人身份证件及复印件；在同一窗口申报缴纳增值税有关税费；在同一窗口领取发票，开票过程复杂且花费时间长。

⁴ 数据来源：https://www.gov.cn/xinwen/2017-03/01/content_5172272.htm#1

份额。第三，自开增值税发票能够缓解企业“现金流约束”，提高企业资产流动性。小企业通常在市场上面临竞争劣势，最明显的是在外部融资和融资成本方面的可用性（Beck & Demircuc-Kunt, 2006）。税收管理作为内源融资的重要渠道，改善企业现金流管理，等于改善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小微企业代开增值税发票时，需要提前预缴增值税税款，导致小微企业很可能在没有获得贷款时已经上缴了税款，严重挤压了企业的现金流，自开增值税发票则可以按照季度汇缴，以上三点积极促进了企业的经营绩效。与此同时，当下游企业更多的获得了小微企业的增值税发票时，形成增值税的自我征管，导致小微企业逃避税行为减少，使得小规模纳税人的实际税负增加。小微企业可以选择开具增值税发票，也可以选择不开具增值税发票，当实际收入大于实际含税成本时，企业仍然开具增值税发票，所以小微企业的税负和经营绩效同时上升，实现征纳共赢。

基于中国纳税征管改革的事实，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增值税制度的异质性企业模型来分析自开发票政策对企业生产经营以及进入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在考虑到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税收征管差异时，自开发票制度会增加小微企业的利润和收入，进而导致企业进入门槛降低，吸引更多企业进入市场。为了检验我们的研究假设，本文利用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和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来考察自开发票政策是否会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本文发现，自开发票政策会导致家庭创业企业提高 30.25% 的营业收入以及 9% 的营业利润，与此同时，政策也增加了政府税收，表现为企业纳税概率、纳税税额提高以及实际税负的增加，实现征纳共赢。本文对企业营业收入进行了一系列的检验，我们试图通过控制更多的变量来减轻其他混杂因素对于基准结果的影响，具体而言，在替换了代理变量、更换样本以及税制改革和减税政策的同时影响后，本文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本文研究进一步对机制因素进行了详细的检验。本文首先需要检验是否有真实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小规模纳税人能够自开增值税发票后，大大便利了其在生产链的供应作用，然而由于增值税的自我征管（self-enforcement）作用（Keen, 2008; Waseem, 2020），其生产经营活动会被下游企业发票监管，可能导致原本低报的收入正常申报，将地下经济正规化，并不是由于真实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为了检验这一机制，我们观察家庭企业的成本是否增加，发现家庭企业的职工人数以及工资总额均增加。接着我们考察企业是否通过上述的三个渠道增加了企业的绩效。我们发现自开发票政策在政府效率和城市营商环境得分高的地区效应较小，证明政策在政府效率较低的地方效应高，出现了纳税遵从效应。其次，我们根据行业-省份的投入产出表构造了行业中间品比例变量（中间品/（中间品+最终品）），发现受处理行业中间品比例越高，政策效应越大，意味着处于供应链上游的企业份额越多，政策越有效，促进了在生产链上游的小微企业

业的发展。最后，我们分析了企业的借贷款情况，我们发现受政策处理行业的企业相比于其他行业的借贷数目和借贷金额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缓解了企业现金流约束。为了系统分析自开发票的政策效应，我们分析了政策的扩展边际，是否会导致受政策处理的行业有更多的企业进入。我们发现受政策处理行业的企业从个人层面和城市层面都有更多的企业进入，且其初始投资减少，表明企业的门槛降低。

本文对三支文献进行了贡献，第一支文献聚焦于财政政策如何助力于小微企业发展，小微企业对于国民经济十分重要，政府也出台了多种多样的方式来促进小微企业的发展。比如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以及对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之前关于财政政策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方式主要集中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 (Banerjee et al., 1994; Luo et al., 2020; Chen and Yang, 2020; 陈彪, 2021; 杨龙见, 2021; 孔东民, 2021)，直接的减税降费促进小微企业经营绩效 (Liu et al., 2017; 李明, 2018; 冯海波等, 2020; 王业斌, 2019; 甘犁, 2019; 王伟同, 2020; 冯俊诚, 2022)、推行“放管服”改善企业营商环境 (宋翔, 2018; 廖富崇, 2019) 上，很少有人关注到税收征管改革对于小微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文详细地研究了增值税纳税征管改革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基于中国的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全国工商注册数据，验证了自开发票政策对于小微企业发展在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方面的促进作用，并深入探讨了其背后的原因。

本文也是对增值税自我征管机制 (self-enforcement) 相关文献的丰富和补充。现有研究对增值税自我征管的具体机制有较为详尽的研究，例如额外的第三方信息 (Third-Party Information) (Gordon and Li, 2009; Kleven et al., 2011; Kumler et al., 2013; Naritomi, 2015; Pomeranz, 2015; 田彬彬, 2021)、行为激励的非对称性 (Asymmetric Incentives) 和常见于低征管强度国家的预扣机制 (Withholding) (Keen, 2008; Paula 和 Scheinkman, 2010; Waseem, 2020; 李昊楠, 2021)。本文研究了一个特殊的机制，以往的文献分析了增值税改的监管效应，提高了纳税遵从，降低了企业利润和投资 (Waseem, 2020)，或者减税效应，提高了企业的利润和投资 (陈钊, 2016; 范子英, 2017)。当增值税链条覆盖到小微企业时，小微企业可以非强制地自行选择开具增值税发票，导致当增值税链条覆盖到小微企业时，小微企业纳税遵从提高，税收增加，同时营业收入和利润增加，证明纳税监管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导致企业经营绩效的恶化，实现了征纳共赢。

第三支文献聚焦于小微企业纳税人征管的文献，小微企业的税务合规执法问题一直困扰着世界各地的税务机关，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Al-Karablieh et al., 2021; Slemrod et al., 2017)。以往的文献从信息化征管 (樊勇, 2020)、金融体系改革的角度探讨了小微企业的税

收合规性 (Balde, 2021; Beck et al., 2014; Blackburn et al., 2012; Slemrod et al., 2017)。Ouyang et al. (2023) 讨论了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数字信息获取两条渠道来影响小微企业的税收违规行为。相比之下, 本文侧重于税收体制改革, 将小规模纳税人纳入增值税抵扣网络, 通过下游企业的监管或许能更有效率地提高小微企业的纳税征管。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 制度背景

在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中, 税收征管部门是改革开放以来组织结构改革最具代表性的部门之一。中国政府于 1994 年引入现代形式的增值税, 从此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到 2002 年, 增值税已成为中国第一大税收来源。小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是国家政策的重点扶持对象。近年来, 国家针对小微企业先后出台了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减免等在内的一系列减税措施, 与此同时, 小规模纳税人的征管体制改革尤其是发票改革相对缓慢且未得到充分的关注。

小规模纳税人不能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由来已久, 这最早可追溯到 1993 年颁布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 (1993) 第 134 号) 的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中就包括“(三) 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在以前的征管模式下, 税务机关不允许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主要原因是, 小规模纳税人财务核算不健全, 无法妥善保管增值税专用发票。税务机关担心小规模纳税人乱开票, 扰乱市场经济。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专用发票的管理, 堵塞偷税漏洞。但是, 由于一般纳税人向小规模纳税人购进货物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无法抵扣进项税额, 此项规定对于小规模纳税人的销售产生了一定影响。国家税务总局因此又印发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由税务所为小规模企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通知》(国税明电 (1994) 第 23 号), 决定由税务机关为小规模企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以方便纳税人经营。该状况一直持续到 2016 年, 期间虽然小规模纳税人认定标准经过几次改变, 但是征纳方式没有得到改进。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的营改增是国家税务总局执行的最大规模的减税措施, 但是旧的政策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营改增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税负的初衷 (林彩云, 2018), 一般纳税人获取了绝大部分政策效应, 小规模纳税人却并未参与其中。小规模纳税人是一个最应该享受到政策优惠的群体, 大部分行业对于增值税发票的巨大需求使得大规模纳税人不能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模式已经严重落后于经济的发展。

出于让国家的扶持政策真正兑现于民的目的，在“金税三期系统”上线等一系列征管方式大力推行的同时，开票系统也在不断升级更新，2016年8月1日，全国91个城市月销售额超过3万元（或季销售额超过9万元）的住宿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主管国税机关不再为其代开，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率与增值税普通发票的一样，按照3%和5%的征收率，分别填写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第2栏和第5栏“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销售额”的“本期数”相应栏次中；试点纳税人销售其取得的不动产需开具专用发票的，仍须向地税机关申请代开。同年11月，政策在全国的住宿业铺开，所有符合要求的小规模纳税人只能自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申请税务机关为其代开。随后在鉴证咨询业、建筑业、工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等行业逐步推开，在2020年2月，该政策在全国范围铺开。当企业选择代开增值税发票时，仍然保持自开增值税普票的权利。

自开发票会从以下渠道促进企业的发展，首先是改善了企业的税收营商环境，实现了“放管服”，无法自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使得小规模纳税人只能到税务机关申请代开或将代开发票政策外包给其他公司，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而税务机关代开，只能在工作日的8小时工作时段内开票，遇周末或节假日都无法开票，这严重影响购买方发票的取得时效，增加了小规模纳税人开具发票的风险，增加了小规模纳税人的成本，费时费力。自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可随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降低企业的纳税遵从成本。其次，代开增值税发票使得企业无法准时顺利地向下游企业提供增值税发票，导致上游企业的小规模纳税人与一般纳税人相比商品和服务价格竞争力下降，自开发票政策完善了增值税的抵扣链条，增强了小规模纳税人在上游市场的竞争力，帮助企业更好地融入产业链，促进企业发展。第三，小规模纳税人在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发票时还需预缴增值税、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费附加等相关税费，造成对小规模纳税人流动资金的预先占用，提前将税款收缴国库，给纳税人带来巨大的经营压力。自开发票政策带来的资金延缓缴纳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从而促进企业增加实体投资。

（二）理论分析

根据前文的制度背景分析，本文在Melitz（2003）异质性企业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增值税制度，以此分析自开发票政策对企业进入及生产经营的影响。

1.模型设定

考虑有许多企业生产差异化产品，把企业的数量标准化为一。企业*i*使用资本和劳动进行生产，其生产函数为：

$$q_i = A_i K_i^\alpha L_i^{1-\alpha} \quad (1)$$

其中, K_i 和 L_i 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数量, $A_i \in (0, +\infty)$ 表示企业的技术水平。企业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技术水平 A_i 的差异, 用 $f(A)$ 表示企业技术水平分布的密度函数。企业事先知道自己的技术水平, 并决定是否进入市场。如果企业选择进入, 首先需要一次性投入固定成本 F , 然后在竞争性市场上购买劳动和资本组织生产, 劳动和资本的价格分别为外生给定的 w 和 r 。由于企业的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 其边际成本为定值, 记 $c = \left(\frac{r}{\alpha}\right)^\alpha \left(\frac{w}{1-\alpha}\right)^{1-\alpha}$ 。

在不考虑税收因素影响的情况下, 当企业 i 的产量为 q_i 时, 对应的成本为 $c_i = F + \frac{c}{A_i} q_i$ 。

企业生产的产品既可以直接作为消费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也可以作为中间品卖给下游企业用于进一步的生产。消费者和下游企业对差异化产品的需求满足 CES 偏好, $\sigma > 1$ 表示这些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消费者和下游企业对产品的总支出为 Y , 并且用 θY 和 $(1 - \theta)Y$ 分别表示消费者和下游企业的支出。

政府对企业征收增值税。根据企业生产规模的不同, 政府把企业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企业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技术水平 A_i 的差异, 技术水平越高的企业, 生产规模越大。为了分析的方便, 假设政府直接设定规模门槛 A^* , 即技术水平大于 A^* 的企业为一般纳税人, 技术水平小于 A^* 的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差异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税率(τ_1)高于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税率(τ_0); 第二, 一般纳税人购买资本的进项税额可以从销项税额中扣除, 而小规模纳税人不能抵扣进项税额; 第三, 一般纳税人把产品销售给下游企业时, 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可以用于下游企业的进项税额抵扣, 而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则不能进行抵扣。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差异会影响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行为, 为了便于区分, 用字母 g 和 s 分别表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

首先分析一般纳税人企业($A_i > A^*$)的决策。企业 i 的产品既可以卖给消费者, 也可以卖给下游企业。假设企业 i 可以对这两类客户实施区别定价⁵, 用 p_{ig}^c 和 p_{ig}^f 分别表示消费者和下游企业得到的含税价格。基于 CES 函数的特点, 可以很容易得到消费者对产品 i 的需求:

$$q_{ig}^c = \frac{(p_{ig}^c)^{-\sigma}}{P_c^{1-\sigma}} \theta Y \quad (2)$$

其中, P_c 表示消费者的价格指数, 将在后面给出定义。下游企业支付的含税价格 p_{ig}^f 中, $\frac{\tau_1}{1+\tau_1} p_{ig}^f$ 属于企业 i 缴纳的增值税, 可以用于下游企业的进项税额抵扣。因此, 下游企业购买产品 i 的实际成本价格为 $\frac{1}{1+\tau_1} p_{ig}^f$ 。相应的, 下游企业对产品 i 的需求为:

⁵ 后面会证明, 由于消费者和下游企业的需求价格弹性相同, 企业在最优定价时, 给消费者和下游企业提供的价格相同。

$$q_{ig}^f = \frac{(p_{ig}^f)^{-\sigma}}{P_f^{1-\sigma}} (1-\theta)Y \quad (3)$$

其中, P_f 表示下游企业购买中间品的价格指数。

一般纳税人企业 i 购买劳动和资本进行生产, 其购买资本的进项税额可以从销项税额中扣除。假设资本品供给方的增值税税率也为 τ_1 , 则企业 i 购买资本的实际成本价格为 $\frac{1}{1+\tau_1}r$ 。

加入税收因素的影响, 当企业 i 的产量为 q_i 时, 对应的生产成本为 $c'_{ig} = \frac{1}{1+\tau_1}F + (\frac{1}{1+\tau_1})^\alpha \frac{c}{A_i} q_{ig}$ 。

企业 i 的利润可以表示为:

$$\pi_{ig} = \frac{1}{1+\tau_1} p_{ig}^c q_{ig}^c + \frac{1}{1+\tau_1} p_{ig}^f q_{ig}^f - [\frac{1}{1+\tau_1}F + (\frac{1}{1+\tau_1})^\alpha \frac{c}{A_i} (q_{ig}^c + q_{ig}^f)] \quad (4)$$

一般纳税人企业 i 在需求函数 (2) 和 (3) 的约束下选择价格 (p_{ig}^c 和 p_{ig}^f)、产量 (q_{ig}^c 和 q_{ig}^f) 来最大化利润 π_{ig} 。可以很容易得到企业 i 的最优产品价格满足:

$$p_{ig}^c = p_{ig}^f = \frac{\sigma}{\sigma-1} (1+\tau_1)^{1-\alpha} \frac{c}{A_i} \quad (5)$$

对应的企业利润为:

$$\pi_{ig} = \frac{1}{\sigma-1} (\frac{1}{1+\tau_1})^\alpha (\frac{c}{A_i})^{1-\sigma} \left\{ \frac{[\frac{\sigma}{\sigma-1}(1+\tau_1)^{1-\alpha}]^{-\sigma}}{P_c^{1-\sigma}} \theta Y + \frac{[\frac{\sigma}{\sigma-1}(1+\tau_1)^{-\alpha}]^{-\sigma}}{P_f^{1-\sigma}} (1-\theta) Y \right\} - \frac{1}{1+\tau_1} F \quad (6)$$

接下来分析小规模纳税人企业 ($A_i < A^*$) 的决策。对于消费者来说, 小规模纳税人销售产品的含税价格 p_{is}^c 就是消费者的购买价格, 其对应的产品需求与公式 (2) 类似。下游企业的情况则与公式 (3) 有所不同。小规模纳税人缴纳的增值税不能用于下游企业的进项税额抵扣, 其出售产品的含税价格 p_{is}^f 就是下游企业的实际成本价格。用 p_{is}^c 和 p_{is}^f 分别表示消费者和下游企业得到的含税价格, 可以分别得到消费者和下游企业的需求为:

$$q_{is}^c = \frac{(p_{is}^c)^{-\sigma}}{P_c^{1-\sigma}} \theta Y \quad (7)$$

$$q_{is}^f = \frac{(p_{is}^f)^{-\sigma}}{P_f^{1-\sigma}} (1-\theta) Y \quad (8)$$

其中, P_c 和 P_f 分别表示消费者和下游企业购买产品的价格指数, 与公式 (2) 和 (3) 中的定义相同。

除了缴纳的增值税不能用于下游企业的进项税额抵扣外, 小规模纳税人企业购买资本的进项税额也不能用于自身的增值税抵扣。因此, 小规模纳税人企业购买资本的实际成本价格就为 r 。加入增值税并不会影响小规模纳税人企业的成本。当企业 i 的产量为 q_i 时, 对应的生产成本为 $c'_{is} = F + \frac{c}{A_i} q_{is}$ 。小规模纳税人企业的增值税税率为 τ_0 , 且满足 $\tau_0 < \tau_1$ 。企业 i 的利润可以表示为:

$$\pi_{is} = \frac{1}{1+\tau_0} p_{is}^c q_{is}^c + \frac{1}{1+\tau_0} p_{is}^f q_{is}^f - [F + \frac{c}{A_i} (q_{is}^c + q_{is}^f)] \quad (9)$$

小规模纳税人企业*i*在需求函数(7)和(8)的约束下选择价格(p_{is}^c 和 p_{is}^f)、产量(q_{is}^c 和 q_{is}^f)来最大化利润 π_{is} ,可以得到企业*i*的最优产品价格为:

$$p_{is}^c = p_{is}^f = \frac{\sigma}{\sigma-1} (1 + \tau_0)^{1-\alpha} \frac{c}{A_i} \quad (10)$$

企业利润为:

$$\pi_{is} = \frac{1}{\sigma-1} \left(\frac{1}{1+\tau_0}\right)^\alpha \left(\frac{c}{A_i}\right)^{1-\sigma} \left\{ \frac{[\frac{\sigma}{\sigma-1}(1+\tau_0)^{1-\alpha}]^{-\sigma}}{P_c^{1-\sigma}} \theta Y + \frac{[\frac{\sigma}{\sigma-1}(1+\tau_0)^{1-\alpha}]^{-\sigma}}{P_f^{1-\sigma}} (1-\theta) Y \right\} - F \quad (11)$$

对应的企业收入 $R_{is} = \frac{1}{1+\tau_0} p_{is}^c q_{is}^c + \frac{1}{1+\tau_0} p_{is}^f q_{is}^f$ 可以表示为:

$$R_{is} = \frac{1}{1+\tau_0} \left[\frac{[(1+\tau_0)^{1-\alpha} \frac{c}{A_i}]^{1-\sigma}}{P_c^{1-\sigma}} \theta Y + \frac{[(1+\tau_0)^{1-\alpha} \frac{c}{A_i}]^{1-\sigma}}{P_f^{1-\sigma}} (1-\theta) Y \right] \quad (12)$$

2.模型求解

考虑该市场的进入均衡。企业*i*事先知道自己的技术水平 A_i 。只有当企业进入市场带来的利润 π_i 大于零时,企业才会选择进入。因此,在均衡状态时,选择进入市场的技术水平最低企业的利润恰好为零。假设市场需求水平 Y 足够高,使得该市场存在小规模纳税人进入。用 $A_0 < A^*$ 表示进入市场的临界企业的技术水平,有进入均衡条件:

$$\frac{1}{\sigma-1} \left(\frac{1}{1+\tau_0}\right)^\alpha \left(\frac{c}{A_0}\right)^{1-\sigma} \left\{ \frac{[\frac{\sigma}{\sigma-1}(1+\tau_0)^{1-\alpha}]^{-\sigma}}{P_c^{1-\sigma}} \theta Y + \frac{[\frac{\sigma}{\sigma-1}(1+\tau_0)^{1-\alpha}]^{-\sigma}}{P_f^{1-\sigma}} (1-\theta) Y \right\} - F = 0 \quad (13)$$

接下来分析价格指数 P_c 和 P_f 。 P_c 表示消费者的价格指数。根据公式(5)和(10),不论是从一般纳税人企业还是小规模纳税人企业购买产品,消费者的实际支出价格都为 p_i^c 。因此,消费者价格指数 P_c 满足条件:

$$P_c^{1-\sigma} = \int_{A_0}^{A^*} \left[\frac{\sigma}{\sigma-1} (1 + \tau_0)^{1-\alpha} \frac{c}{A} \right]^{1-\sigma} f(A) dA + \int_{A^*}^{+\infty} \left[\frac{\sigma}{\sigma-1} (1 + \tau_1)^{1-\alpha} \frac{c}{A} \right]^{1-\sigma} f(A) dA \quad (14)$$

下游企业的价格指数 P_f 略有不同。如果下游企业从一般纳税人企业购买产品,其支付的实际成本价格为 $\frac{1}{1+\tau_1} p_{ig}^f$;如果下游企业从小规模纳税人企业购买产品,其支付的实际成本价格为 p_{is}^f 。结合公式(5)和(10),生产者价格指数 P_f 满足的条件为:

$$P_f^{1-\sigma} = \int_{A_0}^{A^*} \left[\frac{\sigma}{\sigma-1} (1 + \tau_0)^{1-\alpha} \frac{c}{A} \right]^{1-\sigma} f(A) dA + \int_{A^*}^{+\infty} \left[\frac{\sigma}{\sigma-1} (1 + \tau_1)^{1-\alpha} \frac{c}{A} \right]^{1-\sigma} f(A) dA \quad (15)$$

公式(13)、(14)和(15)定义了模型的均衡状态。接下来证明该模型存在唯一的均衡解。为了分析的方便,在公式(13)中,定义 $M \equiv \frac{[\frac{\sigma}{\sigma-1}(1+\tau_0)^{1-\alpha}]^{-\sigma}}{P_c^{1-\sigma}} \theta Y + \frac{[\frac{\sigma}{\sigma-1}(1+\tau_0)^{1-\alpha}]^{-\sigma}}{P_f^{1-\sigma}} (1-\theta) Y$ 。把 M 带入公式(13),可以得到 A_0 关于 M 的函数关系: $A_0 = A_0(M)$ 。显然, A_0 关于 M 是单调递减的。把公式(14)和(15)带入 M 的定义中,可以得到 M 关于 A_0 的函数关系: $M = M(A_0)$ 。显然, M 关于 A_0 是单调递增的。图1.1用横轴表示 A_0 ,用纵轴表示 M ,分别展示了函数方程 $A_0 = A_0(M)$ 和 $M = M(A_0)$ 。联立方程 $A_0 = A_0(M)$ 和 $M = M(A_0)$,可以得到该模型的均衡状态 D 及对应的唯一均衡解 A_0^* 。

接下来分析自开发票政策的影响。如前面论述,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差异

表现为三个方面。自开发票政策影响的是第三个方面，即允许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用于下游企业的进项税额抵扣。此时，下游企业购买小规模纳税人企业生产的产品，实际成本价格由 p_{is}^f 下降为 $\frac{p_{is}^f}{1+\tau_0}$ 。下游企业的产品需求变为：

$$q_{is}^f = \frac{\left(\frac{p_{is}^f}{1+\tau_0}\right)^{-\sigma}}{P_f^{1-\sigma}} (1-\theta)Y \quad (8')$$

小规模纳税人企业的最优产品定价和公式 (10) 一样，保持不变。企业利润和收入分别变为：

$$\pi_{is} = \frac{1}{\sigma-1} \left(\frac{1}{1+\tau_0}\right)^\alpha \left(\frac{c}{A_i}\right)^{1-\sigma} \left\{ \frac{\left[\frac{\sigma}{\sigma-1}(1+\tau_0)^{1-\alpha}\right]^{-\sigma}}{P_c^{1-\sigma}} \theta Y + \frac{(1+\tau_0)^\sigma \left[\frac{\sigma}{\sigma-1}(1+\tau_0)^{1-\alpha}\right]^{-\sigma}}{P_f^{1-\sigma}} (1-\theta)Y \right\} - F \quad (11')$$

$$R_{is} = \frac{1}{1+\tau_0} \left[\frac{\left[\frac{\sigma}{\sigma-1}(1+\tau_0)^{1-\alpha}\right]^{1-\sigma}}{P_c^{1-\sigma}} \theta Y + \frac{(1+\tau_0)^\sigma \left[\frac{\sigma}{\sigma-1}(1+\tau_0)^{1-\alpha}\right]^{1-\sigma}}{P_f^{1-\sigma}} (1-\theta)Y \right] \quad (12')$$

对比利润公式 (11) 和 (11')、收入公式 (12) 和 (12')，可以很容易发现，自开发票政策增加了小规模纳税人企业的利润和收入。此即为如下论点 1：

论点 1： 自开发票政策增加了小规模纳税人企业的利润和收入。

小规模纳税人企业*i*缴纳的税额为 $\tau_0 R_{is}$ 。自开发票政策增加了小规模纳税人企业的收入 R_{is} ，因此，可以很自然得到如下论点 2：

论点 2： 自开发票政策增加了小规模纳税人企业缴纳的税收。

自开发票政策增加了在位企业的收入和利润，这会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市场。在均衡状态，只有利润为正的企业才会选择进入市场。对于临界企业来说，其利润恰好为零。根据公式 (11')，可以得到进入均衡条件为：

$$\frac{1}{\sigma-1} \left(\frac{1}{1+\tau_0}\right)^\alpha \left(\frac{c}{A_0}\right)^{1-\sigma} \left\{ \frac{\left[\frac{\sigma}{\sigma-1}(1+\tau_0)^{1-\alpha}\right]^{-\sigma}}{P_c^{1-\sigma}} \theta Y + \frac{(1+\tau_0)^\sigma \left[\frac{\sigma}{\sigma-1}(1+\tau_0)^{1-\alpha}\right]^{-\sigma}}{P_f^{1-\sigma}} (1-\theta)Y \right\} - F = 0 \quad (13')$$

公式 (14) 表示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P_c 不受影响，但是公式 (15) 表示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_f 会有所调整，因为下游企业的进项税额抵扣实际上降低了购买产品的价格。调整后的生产者价格指数满足条件：

$$P_f^{1-\sigma} = \int_{A_0}^{A^*} \left[\frac{\sigma}{\sigma-1} (1+\tau_0)^{-\alpha} \frac{c}{A} \right]^{1-\sigma} f(A) dA + \int_{A^*}^{+\infty} \left[\frac{\sigma}{\sigma-1} (1+\tau_1)^{-\alpha} \frac{c}{A} \right]^{1-\sigma} f(A) dA \quad (15')$$

公式 (13')、(14) 和 (15') 定义了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发票制度下的均衡状态。采用之前类似的方法，可以证明这时候仍然存在唯一的均衡解。我们主要关注均衡状态的变化。定义 $M' \equiv \frac{\left[\frac{\sigma}{\sigma-1}(1+\tau_0)^{1-\alpha}\right]^{-\sigma}}{P_c^{1-\sigma}} \theta Y + \frac{(1+\tau_0)^\sigma \left[\frac{\sigma}{\sigma-1}(1+\tau_0)^{1-\alpha}\right]^{-\sigma}}{P_f^{1-\sigma}} (1-\theta)Y$ 。把 M' 带入公式 (13')，可以得到和前文一样的函数关系： $A_0 = A_0(M')$ ，并且 A_0 关于 M' 是单调递减的。把公式 (14)、公式 (15') 关于 P_c 和 P_f 的定义带入 M' 可以得到 M' 关于 A_0 的函数关系： $M' = M'(A_0)$ 。显然， M' 关

于 A_0 是单调递增的。而且，可以很容易证明： $M'(A_0) > M(A_0)$ 。把 $M' = M'(A_0)$ 同样地表示在平面坐标图上，如图 1.2 所示。均衡状态从 D 移动到 D' ，对应的企业进入门槛 A_0 下降，更多地企业进入市场。此即为如下论点 3：

论点 3：自开发票政策降低了企业进入门槛，吸引更多企业进入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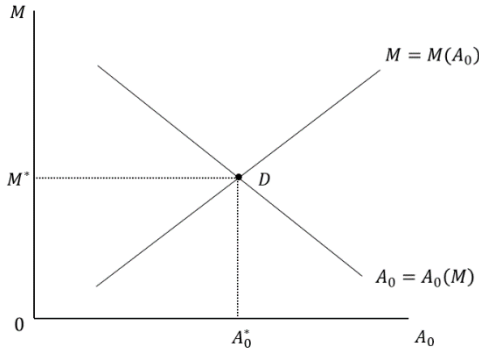


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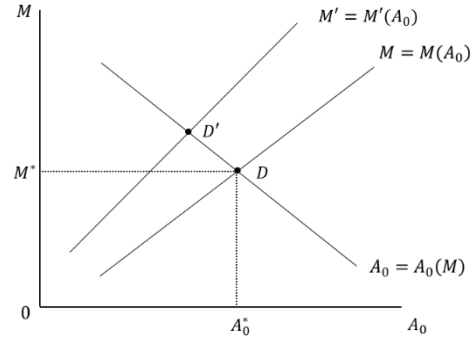


图 1.2

图1：模型均衡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

如图 1-1 所示，本文从理论上证明了自开发票政策对于小微企业的促进作用，为了实证检验自开发票政策对于家庭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利用自开发票政策在时间，和行业两个层面的差异，构建以下的双重差分模型识别纳税征管对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具体的模型构建如下。

$$Y_{ijct} = \alpha_0 + \alpha_1 Treat_j \times Post_t + \alpha_2 Control_{ijct} + \mu_j + \lambda_t + \psi_{ct} + \varepsilon_{ict}$$

下标 $ijct$ 分别表示家庭、行业、城市和时间，被解释变量 y_{ijct} 表示家庭创业的经营绩效以及纳税状况， $Treat_j$ 是自开增值税发票政策的度量， $Post_t$ 为政策出台年份的虚拟变量。 $Control_{ijct}$ 代表控制变量集合，具体包括创业者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婚姻、文化程度等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以及家庭资产等家庭层面的变量。考虑特定时间和行业层面不随时间变化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 μ_j 和时间固定效应 λ_t 。由于不同城市的特殊产业政策和税收优惠活动的实施，从而破坏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平行趋势假设，因此我们还在模型中加入了城市与年份交互的固定效应 ψ_{ct} ，便于控制城市层面的特征。 ε_{ijct} 为随机扰动项，系数 α_1 反映了小规模纳税人发票征管模式改革带来的家庭创业影响的净效应。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为家庭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以及纳税状况。

在 CHFS 数据库中，询问存在家庭创业行为的家庭，“去年/今年上半年，该项目的营业收入是多少元”，来分析存在创业行为的家庭最主要/最新项目的营业状况。

(2)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自开增值税发票政策的虚拟变量，用以刻画纳税征管改革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当 j 行业在 t 年试点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发票后， $Treat_j \times Post_t$ 赋值为 1，否则为 0，本文选择自开增值税发票政策实施作为试点时间，与多数研究一致，将下半年实施的行业视为下一年度开始试点。

(3) 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一系列个人、家庭和地区层面的变量，具体包括家庭户主的年林 (age)、年龄的平方项 ($age2$)、户主的性别 ($gender$)、户口 (res)、政治面貌 ($party$)、婚配 ($marry$)，也控制了家庭的资产 ($asset$) 和风险偏好 ($risk$)，以及城市和年份的固定效应来控制地区层面的差异。相关变量的定义见表 1。

(4) 其他变量。本文先探究了自开增值税发票政府是否导致企业的经营绩效增加，接着分析是否会导致更多的企业进入市场。从个体层面来说，考虑到创业是家庭成员的联合决策，参照以往文献 (尹志超等, 2015; 尹志超等, 2019)，我们在家庭层面定义创业。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问卷中关于创业的问题为“目前，您家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包含个体户、租赁、运输、网店、经营企业等？”并根据创业动机，将家庭创业区分为主动创业和被动创业。从城市层面来说，本文构建了指标企业进入率，用城市 c 在 t 时间，在行业 j 内新成立企业数量除以该城市该行业现有企业的数量，来表示企业的进入率。

(二)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 2013-2019 年四轮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数据。该数据是一项由西南财经大学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实验中心共同开展的大规模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调查采用分层三阶段概率比例随机抽样设计，第一阶段抽样使用县，第二阶段抽样使用县的居住社区，最后阶段抽样使用从社区和村委会抽取的住户。这一过程确保最终样本在经济发展和地理位置方面都能代表整个国家的人口。该数据收集了除西藏、新疆、港澳台地区以外的 29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414 个县 (区) 的家庭和个人信息。在剔除掉相关变量缺失的记录后，最终共获得了 78250 多户家庭的微观数据，其中得到创业家庭样本 17318 户。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收集了家庭人口统计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居住区域以及资产与负债、保险与保障、收入与支出等各方面的信息。在资产部分，详细询问了家庭是否有工商业经营项目，并进一步询问了工商业项目经营情况，包括营业收入、营业利润、银行信贷等，为本文研究小规模纳税人创业以及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提供了非常好的数据支持。

二是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该数据库包含了 1949 年至 2021 年在中国注册的企业信息，包括超过 2 亿家工商企业，覆盖 337 个市，该数据库是由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而成的，包括商业注册日期、业务名称、注册资本、注册地址、行业分类、经营状态和业务关闭日期。他还提供了企业的成立形式，例如独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制等信息，能准确的识别企业的进入。本文首先利用 CHFS 数据的家庭样本进行基准回归与分析企业的经营绩效，然后利用 CHFS 数据和工商企业注册数据识别政策是否会导致企业进一步进入市场。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ln_yysr1	营业收入取对数	15673	8.6405	4.0781	0	17.7275
js	是否缴税	11429	0.3637	0.4811	0	1
ln_sfze1	税费总额取对数	11242	2.7743	4.065	0	15.4249
sjsf	实际税负	9115	0.0506	0.1133	0	0.744
treat	自开增值税发票当年及以后年份为1，其他为0	15908	0.079	0.2697	0	1
age	年龄	15904	47.3505	12.0162	22	81
age2	年龄的平方项	15904	2386.4487	1191.6371	484	6561
edu	受教育程度	15908	0.0689	0.2533	0	1
res	户口类型	15908	0.5658	0.4957	0	1
marry	婚配	15896	0.908	0.2891	0	1
gender	性别	15908	0.8048	0.3964	0	1
party	是否为党员	14505	0.1248	0.3305	0	1
risk	冒险程度	12695	3.9345	1.3223	1	6
ln_asset	家庭资产的对数	15908	13.5238	1.3737	0	18.5958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纳税方的收益

1.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重点考察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发票对家庭创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表 2 给出了基准回归的结果。第（1）列表示只加入了自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政策这一虚拟变量以及时间和行业的固定效应，此时 α_1 的系数显著为正，与理论预期一致，即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发票”政策有效的提高了家庭创业的经营绩效。在随后的第（2）-（4）列中，依次加入了城市固定效应，家庭和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以及城市和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对不同层面进

行固定效应控制。第四列是我们最严格的假设，如第四列所示，当某行业实施小规模纳税人自行开具增值税发票政策后，家庭创业的营业收入显著提高，参数估计值表明，与尚未开始自开发票的行业的相比，进行了自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业的企业营业收入提高了 30.25%，该效应是显著的。上述逐步回归的结果基本证实了本文的理论预期，即自开发票政策确实会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且结果是稳健的。

表 2 基准回归

	(1)	(2)	(3)	(4)
VARIABLES	ln_yysr1	ln_yysr1	ln_yysr1	ln_yysr1
treat	0.3642*** (0.0738)	0.3523*** (0.0691)	0.3224*** (0.0768)	0.3025** (0.1104)
age			0.0119 (0.0143)	0.0091 (0.0143)
age2			-0.0003* (0.0001)	-0.0003 (0.0002)
edu			-0.0385 (0.0567)	-0.0603 (0.0687)
res			0.0957** (0.0448)	0.1043** (0.0406)
marry			0.2058** (0.0843)	0.2301*** (0.0781)
gender			0.1460*** (0.0451)	0.1317*** (0.0409)
party			0.0279 (0.0697)	0.0041 (0.0581)
risk			-0.0501 (0.0307)	-0.0511* (0.0273)
ln_asset			0.4628*** (0.0235)	0.4593*** (0.0221)
Constant	8.6082*** (0.0059)	9.0009*** (0.0059)	2.2573*** (0.3400)	2.3800*** (0.3372)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NO	YES	YES	NO
城市*年份	NO	NO	NO	YES
Observations	15,637	14,520	10,403	10,371
R-squared	0.7043	0.6727	0.7422	0.7557

2 稳健性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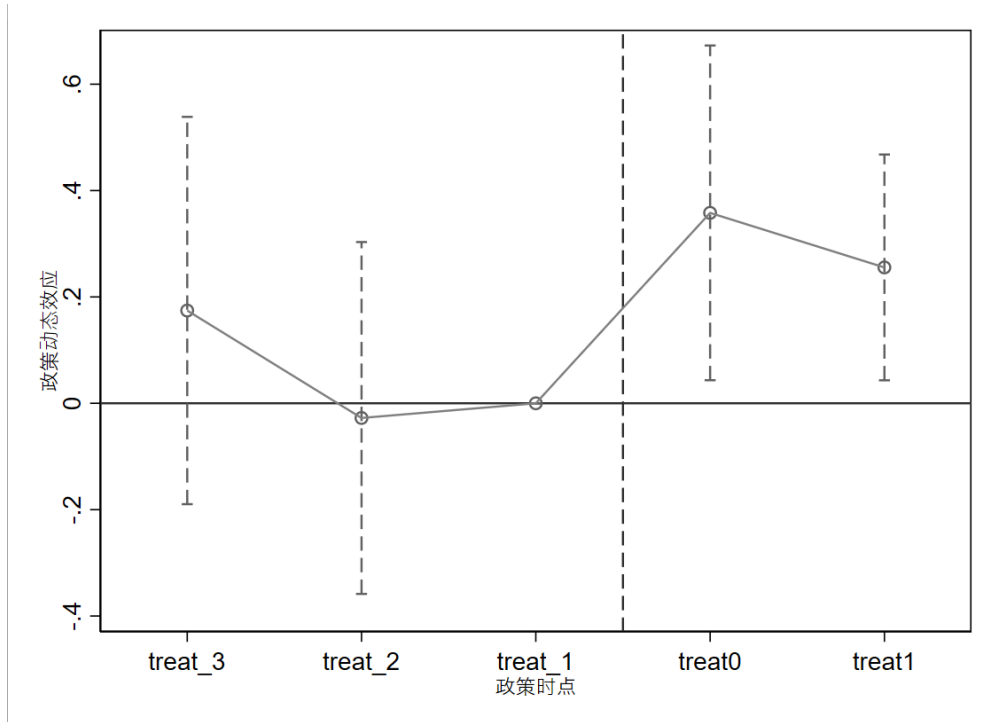


图2 平行趋势检验

我们使用事件研究法对本文双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说进行检验，如图一所示，以家庭创业的营业收入为被解释变量的平行趋势检验，具体而言，本文将各行业试点的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政策提前了 1-3 期，如果此时自开增值税发票政策依然显著为负，则说明企业的经营绩效的提升可能是由于同期其他政策的干扰，而非纳税征管改革带来的影响。如下图所示。在政策实施前，实验组和控制组的结果变量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政策实施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营业收入发生显著变化，证实了本文的双重差分模型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3. 考虑异质性处理效应

正如 Goodman-Bacon(2021)所述，双向固定效应的 DID 估计量实际上是所有可能的两期 DID 的加权平均值，当处理效应存在异质性时将会使得估计结果存在偏差，其平行趋势假设也将存在偏差。为此，本文借鉴刘冲等（2022）的思路，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处理效应的异质性进行考虑：一是根据 Cengiz et al.(2018) 的方法，利用堆叠回归的方式，给每个处理组选择“好的控制组”组成数据集，按照相对事件时间，堆叠数据集并进行回归估计。动态效应的估计结果如图 3 (a) 所示，政策实施之前估计系数在 0 附近且不显著，改革之后系数显著为郑，证明了基准结果的稳健性。二是根据的 Borusyak (2021) 方法，利用插补的方法插补出合理的反事实结果，从控制组样本中估计出每个处理组个体每个时期的反事实结果变

量，避免“坏的控制组”问题的出现，如图3（b）所示，估计结果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上述结果表明异质性处理效应对本文结果的影响十分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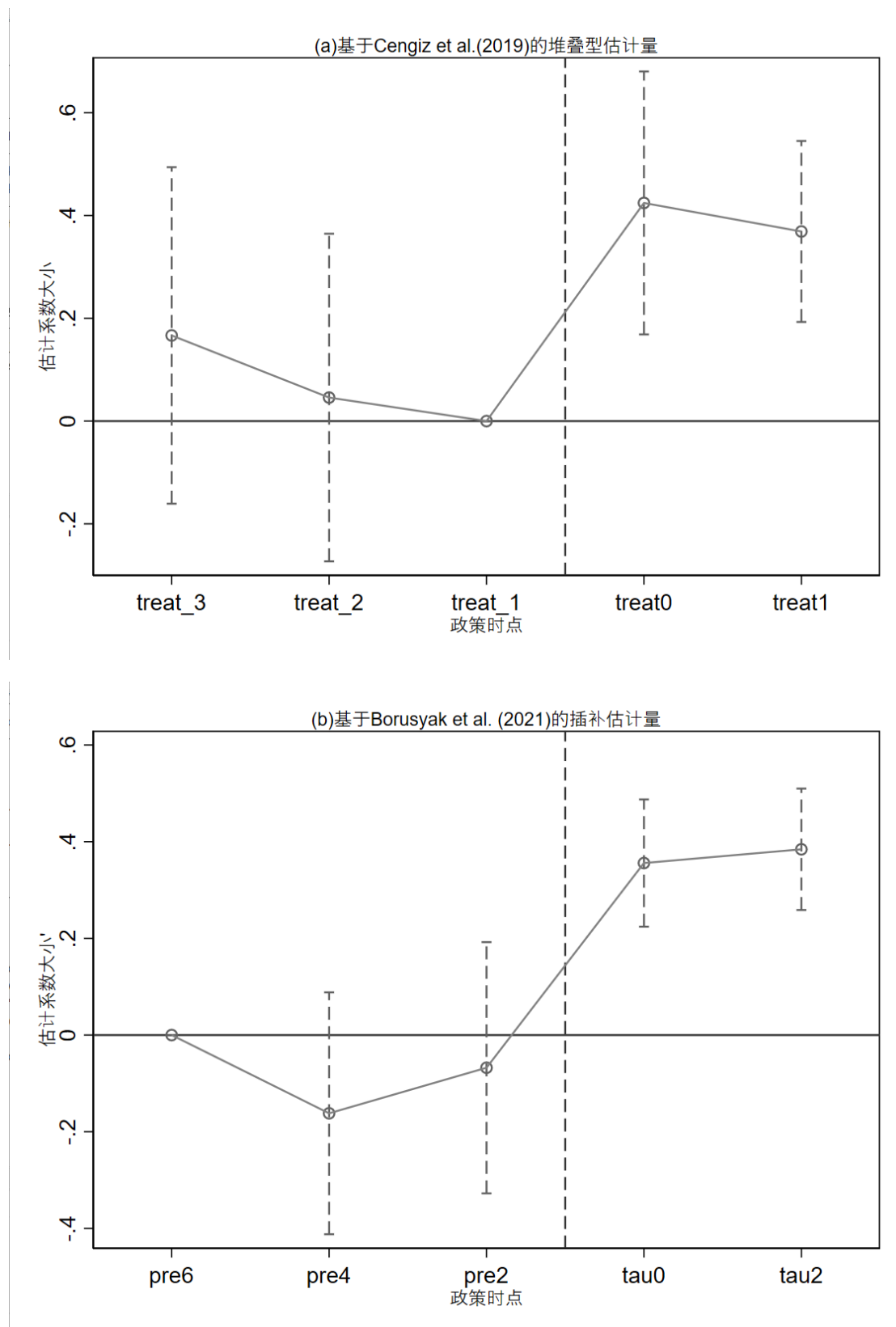


图3 考虑处理效应异质性后改革的动态效应

4.其他稳健性检验

在前文中，本文验证了平行趋势假定的成立，排除了纳税征管改革政策实施前其他政策对于基准回归结果的干扰，但实际上仍有其他混杂因素会对本文的基准回归进行干扰，下文则将逐一论证。首先本文使用了其他财务指标作为替代指标，考虑到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发票后，下游的企业更多的索要发票，可能导致上游小规模纳税人之前原本应该低报的收入会正常报告，导致营业收入的不正常增加，本文使用营业利润作为营业收入的替代变量，本文采取了营业收入的两种表示方式，表3的列（1）表示取营业收入的对数，考虑到营业利润有部分数据为负值，列（2）使用营业利润的绝对值，结果发现营业利润也显著增长，增加了6.018万元，说明小规模纳税人确实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实际的改善了小规模企业的经营绩效，而不只是在会计账目上；二、实验组和控制组。自开增值税发票改革在17年住宿业和鉴证咨询业中实施，然而CFPS问卷中分类为住宿和零售业大类以及现代服务业大类，中间混合了其他行业的效应，在基准回归中，本文剔除了“住宿和零售业”这个分类，列（3）中继续排除现代服务业的影响，得到最为纯净的控制组。结果发现系数依然显著，证明了结果的稳健；三、同期行业干扰政策的排除，同期推出的其他税收改革举措也可能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带来影响，进而混着自开增值税发票的改革影响。其中，“营改增”和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改变是近年来影响较大的改革政策，也会对家庭创业的经营绩效带来直接的影响。“营改增”可能会通过以下两个渠道来影响企业经营绩效，一是营改增的实施能够有效打通和延长抵扣链条、减少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导致企业经营绩效的增加，二是营改增会促进分工，有利于推动专业化分工，调整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从而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为了尽可能缓解“营改增”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将“营改增”的政策变量直接加入回归，结果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在考虑“营改增”政策干扰的因素之后，本文的结论仍然成立。二是小规模纳税人门槛的变化，国家对小规模纳税人的门槛经历多次调整⁶，而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调整对于企业的账务处理以及经营行为都有较大的影响，在2018年5月将所有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定位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500万元及以下，为了排除门槛改变带给小规模纳税人的影响，本文直接将门槛改变的政策变量加入回归。表四中的（4）-（5）列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两项政策的影响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且

⁶ 2008年国务院修改了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将小规模纳税人的认定标准降至从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为50万元和从事货物批发或零售的为80万元。在进行营改增试点之后，国务院对试点纳税人的小规模纳税人认定标准定为500万元，与非试点纳税人的50/80万元的标准并立。

估计结果在 5%水平上显著，大小与基准回归相差不大，证明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四、Chen (2022) 指出通过改变 y 的计量单位（例如从 1 美元改成 1 美分），使用 $\log(y+1)$ 的回归结果会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考虑到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ln_yysr 中有 0.58% 的数据为 0 值，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直接用 $\log(y)$ 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并无显著变化。五、考虑到交错双重差分的异质性处理效应，本文使用 Cengiz et al. (2018) 的估计方法构建堆叠处理效应，结果依然是稳健的。六、本文根据周茂等 (2018) 的方式，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限于篇幅，报告在附录中，结果仍然是稳健的。

表 3 稳健性检验

VARIABLES	(1) ln_yylr1	(2) yylr2	(3) ln_yysr1	(4) ln_yysr1	(5) ln_yysr1	(6) ln_yysr2	(7) ln_yysr1
treat	0.0940** (0.0424)	6.0108** (2.8170)	0.2518** (0.1120)	0.3006** (0.1240)	0.3141** (0.1094)	0.3028** (0.1075)	0.3465*** (0.0665)
tax_reduce				0.0058 (0.1340)			
treat_mk					-0.1027 (0.1517)		
Constant	2.3520*** (0.2711)	-49.862*** (12.4762)	2.1963*** (0.3015)	2.3791*** (0.3368)	2.4091*** (0.3392)	2.3805*** (0.3105)	1.7470*** (0.209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7,505	8,865	9,914	10,371	10,371	10,325	19,389
R-squared	0.9276	0.1445	0.7560	0.7557	0.7557	0.7934	0.7801

(二) 征税方的收益

前文基准回归的结果已经证明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能够大大增加改革行业内家庭创业的经营绩效，在本节中，我们将评估其纳税行为，是否会导致征税方收益的增加。为了验证论点二，我们考察企业的缴税状况，调查问题包括“该项目是否缴纳税费？”，“去年/今年上半年，该项目缴纳的税费总额是多少元？”，根据第一个问题，我们构造一个虚拟变量，缴税为 1，不缴税为 0，根据第二个问题，我们构建了缴纳税费的对数。第三，我们利用缴纳税费比上企业的营业利润来反映企业的实际税负。我们使用这三个变量作为因变量来估计

基线回归，发现相比于未收政策影响行业的企业，能自开增值税发票的家庭创业缴税的概率上升了 9.8%，缴税的数额上升了 39.8%，考虑到缴纳税费的均值为 17693，结果表明，受到政策处理的行业缴纳税费平均增加了 7041.8 元，该效应是可观的。而企业的实际税率也上升，增加了 4.6%，实现了征税方的收益。

表 4 征税方收益

VARIABLES	(1)	(2)	(3)
	js	ln_sfze1	sjsf
treat	0.1093*** (0.0373)	0.4612* (0.2200)	0.0469*** (0.015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Constant	-0.4040*** (0.0796)	-4.9902*** (0.8254)	-0.1085* (0.0561)
Observations	13,016	12,794	10,344
R-squared	0.1930	0.2187	0.1795

五、机制检验

(一) 是否存在真实的经营活动增加

前文基准回归的结果已经证明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能够大大增加改革行业内家庭创业的经营绩效，在本章中，我们将评估解释其工作原理以及可能的渠道或机制。首先的担忧的是营业收入的增加并不是由于实际经营活动增加带来的，而是由于小规模纳税人开具更多的增值税发票，无法隐藏之前低报的收入，使之前未开发票的收入转移到了账目上，导致营业收入的激增，实际的经营并没有增加。为了验证这一机制的存在性，我们通过考察现有职工人数和员工成本总额以及缴税状况来考察该结果。调查问题包括“除您和您家庭成员以外，目前该项目还雇佣了多少员工？包括目前雇佣的临时工”，“平均每位员工一个月的雇佣成本是多少钱？”根据第一、二个问题，我们构造了两个变量，分别为职工人数的对数，职工总成本的对数，我们使用这两个变量作为因变量来估计基准回归，首先我们比较了受政策影响行业的家庭创业的职工人数与未受政策影响行业的家庭创业的职工人数，发现相比于

未受政策影响的企业，能自开增值税发票的家庭创业企业职工人数增加了 12.8%，而职工成本总额增加了 28.8%，说明不仅职工人数在增加，平均职工成本也在增加，证明了真实的经营活动产生

表 5 是否有真实经营活动产生

VARIABLES	(1) ln_xyzg	(2) ln_zgcb	(3) ln_yysr1	(4) ln_yysr1	(5) ln_yysr1
treat	0.1280** (0.0511)	0.2883*** (0.0894)	0.2208 (0.1574)	0.3264* (0.1844)	0.6534** (0.2935)
treat_zfxl2			-0.0171* (0.0097)		
treat_bus2				-0.0180*** (0.0053)	
treat_MR2					0.7336* (0.403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1.5259*** (0.3941)	-6.8933*** (1.1791)	2.5109*** (0.3276)	2.5408*** (0.3304)	2.9682*** (0.4055)
Observations	10,348	9,525	9,593	9,615	9,185
R-squared	0.3772	0.3479	0.7762	0.7752	0.7587

（二）纳税遵从成本降低

接着我们探究自开增值税发票政策如何导致经济活动的增加，进而导致经营绩效增加。

本文考虑的第一条机制是自开增值税发票政策可能大大降低了小规模纳税人的纳税遵从成本，改善了企业的所处地区的营商环境。已有大量的文献证明营商环境的改善和纳税遵从成本降低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樊勇等，2020；张龙鹏等，2016；毕青苗，2020）。无法自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使得小规模纳税人只能到税务机关申请代开或将代开发票政策外包给其他公司，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而税务机关代开，只能在工作日的 8 小时工作时段内开票，遇周末或节假日都无法开票，这严重影响购买方发票的取得时效，增加了小规模纳税人开具发票的风险，增加了小规模纳税人的成本，费时费力。自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可随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降低企业的纳税遵从成本。

为了验证这一机制的有效性，我们参考了李志军（2018）《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中

城市营商环境总得分以及政府效率得分，与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交乘，进行三重差分分析，其背后的逻辑是如果一个地区的政府效率和营商环境越差，则该政策的效应越明显。表五的(3) - (4) 参数估计表示，相比于高政府效率 and 好营商环境的地区，低政府效率和差营商环境的地区政策效应更高，即自开增值税发票政策提高了地区的营商环境，减少申请代开发票过程中的成本，提升了经营绩效。

(三) 生产链参与

我们的第二个解释与生产链参与有关，如何深入参与生产链，促进企业分工是小微企业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企业分工能大大提升产业关联度和企业经营绩效。(范子英, 2017; 陈钊, 2016) 无法自开增值税发票使得小规模纳税人只能到税务机关申请代开，这严重影响了购买方获得发票的时效，增值税的特性为自我征缴，环环抵扣，生产链种的某一环断裂将会导致税收成本的激增，增加流通环节的重复征税。及时有效地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够增强小规模纳税人在生产链中的竞争力，促进小规模纳税人进入生产链，同时降低下游行业的成本。

为了评估该条机制的有效性，本文使用了 2012 的省级层面的投入产出表，我们进行了三重差分分析，以检验是否处于中间商品高比例的行业受到政策影响更大。具体来说，我们构造了一个变量中间品使用比例，各行业的中间使用 / (中间使用 + 最终使用)，然后将之与政策处理变量进行交乘，列 (5) 表示 2012 年中间品使用比例，然后我们建立了一个三重差分来估计结果，表五的 (5) 列表明了，在自开增值税发票政策实施后，高中间产品比列的行业政策效应越明显，中间品使用比例越高，政策影响越大。

(四) 现金流压力缓解

本文的第三个解释是缓解了家庭创业的现金流压力，现金流约束，信贷约束成为了小微企业难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文献中以及被广为证明。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落后，银行的信贷领域又存在信贷歧视，导致中国的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Zwick and Mahon, 2017; 于文超等, 2018)。小规模纳税人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小规模纳税人还需预缴增值税、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费附加等相关税费，造成对小规模纳税人流动资金的预先占用，提前将税款收缴国库，给纳税人带来巨大的经营压力。自开发票政策带来的资金延缓缴纳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从而促进企业增加实体投资。与此同时，免税政策难以落实。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在 10 万元以下 (按季缴纳的为 30 万元以下) 的，享受免征增值税待遇。小规模纳税人当日代开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则这笔收入不能享受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策这一规定使得对小规模纳税人的优惠免税政策形同虚

设。形成了现金流压力。

为了验证这一机制的有效性，我们首先关注 CHFS 的调查中的六个问题，检验能够自开增值税发票的家庭是否获得了更少的贷款和借款。调查问题包括：“目前，您家是否因【工商业】生产经营活动有尚未还清的银行/信用社贷款？”，“您家目前共有几笔工商业贷款”，“目前，这笔贷款还欠多少钱？”，“除了银行/信用社贷款以外，目前您家是否因工商业生产经营活动有尚未还清的民间借款？”，“您家目前共有几笔借款？”，“目前，这笔借款还欠多少钱？”，家庭对第一和第四个问题的回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指标变量，如果一个家庭在信贷获取或者借款方面回答“是”，则取值为 1，面对第三个和六个问题，我们构建了一个变量，贷款金额和借款金额，他是回答贷款和借款金额的对数。我们通过使用六个变量作为因变量来估计基准回归。

表 6 的第 (1) 列和第 (2) 列分别表达目前是否有贷款和是否有借款，结果表明政策实施后，受政策影响的企业借贷行为并没有显著的差异。第 (3) 和第 (4) 列分别表明借款数目和贷款数目，参数估计表明，政策实施后，受到政策处理的家庭创业目前存在的借款数目和贷款数目都显著下降了，贷款数目平均下降了 0.09 笔，借款数目平均下降了 0.11 笔。第 (5) 列和第 (6) 列分别表示目前贷款所欠金额和目前借款所欠金额，这些结果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是显著的，受政策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更好，借款和欠款的数额都更少。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自开增值税发票政策缓解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使得企业之前被提前的征缴税款进入企业使用。

表 6 信贷状况分析

VARIABLES	(1) dk_dummy	(2) jk_dummy	(3) dksm	(4) jksm	(5) ln_sjdk1	(6) ln_sjkl
treat	0.0034 (0.0088)	-0.0017 (0.0135)	-0.0904*** (0.0188)	-0.1126*** (0.0383)	-0.2555* (0.1363)	-0.2773* (0.156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3235*** (0.0683)	0.1544** (0.0701)	-0.4236** (0.1745)	0.0029 (0.1641)	-3.6596*** (0.8933)	1.0553 (0.6577)
Observations	10,290	10,279	10,237	10,205	10,002	9,819
R-squared	0.1231	0.1464	0.0858	0.1060	0.1383	0.1360

六、自开发票的政策的进一步分析：企业进入

随着不断优化我国税收营商环境和深化“放管服”专项改革工作的逐步推进，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数量出现了“井喷式”增长，2020年，涉税市场主体全国新增1144万户，同比2019年增长10.1%，“十三五”期间，新办涉税市场主体增速较快，累计达5745万户⁷。不少文献从商事制度改革（张龙鹏，2016；毕青苗，2018；）、地方保护（叶宁华等，2017）、减税降费（田磊等，2020）的视角解释了企业进入。我们已经证明，自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显著增加企业的经营绩效，然而这种经营绩效是否能带动更多企业进入市场，是否实现了创业的增加？接着我们分析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发票的扩展边际。

（一）企业进入门槛

正如论点二所示，在异质性企业模型里，质量最高的企业首先选择进入市场，随着市场的扩大，更多的企业进入，就表现为创业门槛下降。与此同时，自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仅显著的缓解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促进企业进入中间品流动，而且减少了纳税的遵从成本，实现了放管服，优化了税收营商环境，可能会导致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降低。我们使用了两部分的数据，分别度量了企业的进入成本以及企业的进入率。首先是利用CHFS数据，考察创业的门槛是否降低，我们使用的第一个变量是CHFS数据中，调查问题：“您家参与该项目时总投资是多少？”我们构造了一个变量，初始投资是指参与投资时金额的对数。具体来说，我们将企业成立的时间与政策处理的时间对应，让受到政策处理的家庭的初始投资与尚未受到政策处理的家庭创业的初始投资进行对比，估计如第一列所示，表明改革后家庭创业的初始投资显著降低，参数估计表明，受到政策影响的家庭比未受到创业影响的约减少26.6%的初始投资。

我们使用的第二套创业的数据来自于全国工商注册数据库，我们提取了工商注册数据库中的每个企业的注册资本，并按照城市、行业、年份进行平均，虽然企业的注册资本不等于企业的实际投资金额，但是也跟初始投资成正相关，我们构建了如下方程进行分析：

$$\ln_zcb_{jct} = \alpha_0 + \alpha_1 Treat_j \times Post_t + \mu_j + \lambda_t + \psi_{ct} + \omega_{kt} + \varepsilon_{ict}$$

\ln_zcb_{jct} 表示在城市c，属于j行业在t年的所有企业的平均注册资本， $Treat_j \times Post_t$ 表示政策处理变量，考虑特定时间和行业层面不随时间变化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控制了

⁷ 国家税务总局.十组年度税收大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潜力大活力足[EB/OL].<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80/c5161039/content.html>: 2021年1月25日

行业固定效应 μ_j 和时间固定效应 λ_t 。由于不同城市的特殊产业政策和税收优惠活动的实施，，因此我们还在模型中加入了城市与年份交互的固定效应 ψ_{ct} ，便于控制城市层面的特征，同时还控制了产业分类（一、二、三产业）与时间的交互项来控制随时间变化的行业层面的效应， ε_{ijct} 为随机扰动项。如表 7 的第（二）列所示，我们发现自开增值税发票会对企业的注册资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平均会导致受政策处理企业的注册资本降低 12%。

由于小规模纳税人的认定并不完全按照应纳税所得额或者注册资本，我们无法识别出哪些企业为小微企业，而政策对于企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小微企业。为了识别政策的有效性，本文在整个工商注册数据库中根据企业的性质对注册资本进行平均，按照企业注册资本的平均大小⁸，将企业分为“小规模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小规模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普通合伙、有限责任公司、联营企业、股份合作制、集体所有制，大规模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港、澳、台、私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然后进行分样本回归，在样本中分别保留“小规模企业”和“大规模企业”，重新计算每个城市每个行业每年新注册公司的平均注册资本。表 7 的第 3 列是小规模企业样本，发现该政策会导致小规模企业的注册资本减少 28.6%，而对大规模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以上证据证明自开增值税发票政策导致企业进入市场的初始投资减少，进入市场的门槛降低。

表 7 企业进入门槛

VARIABLES	(1) ln_cszc1	(2) ln_zczb	(3) ln_zczb	(4) ln_zczb
atreat	-0.2746** (0.1211)	-0.1211*** (0.0197)	-0.2863*** (0.0203)	0.1759 (0.1266)
控制变量	是	否	否	否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NO	NO	NO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产业类型*年份	NO	YES	YES	YES
Constant	8.3494*** (0.1738)	14.9963*** (0.0037)	15.1657*** (0.0038)	15.3177*** (0.0231)
Observations	10,366	173,137	165,586	33,398
R-squared	0.3057	0.5638	0.5144	0.5913

⁸ 具体的数据存在附录中

(二) 企业市场进入率

企业经营绩效的增加是否导致更多的企业进入市场？呼应前文的理论分析中的论点 2，本文采用了两套数据来证明家庭创业的增加，首先是 CHFS 数据中，询问“目前，您家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包括个体户、租赁、运输、网店、经营企业等”，若回答是，则取值为 1，回答否，取值为 0。由于该政策是在行业层面进行的，如果一个家庭未进行创业也就不存在行业层面的政策处理，本文采用多值选择模型来进行分析，将现有的数据扩充，识别出个体 i 在时间 t 内是否在行业 j 里创业，表示为 Y_{ijct} 。若不存在家庭创业，则在所有行业的取值均为 0。我们采用以下模式进行估计：

$$Y_{ijct} = \alpha_0 + \alpha_1 Treat_j \times Post_t + \alpha_2 Control_{ijct} + \mu_j + \lambda_t + \psi_{ct} + \varepsilon_{ict}$$

Y_{ijct} 表示在城市 c 中的户主 i 在时间 t 时是否在 j 行业有创业，其余变量定义与基准回归一致，表八的第 (1) 列展示了多值选择模型的结果，政策实施后，家庭在受政策影响的行业创业概率变高。

第二个是工商注册数据，为了排除地区层面的企业数量和创业氛围的不同，本文构建了一个指标，企业进入率，用城市 c 在 t 时间，在行业 j 内新成立企业数量除以该城市该行业现有企业的数量，检验受政策处理的行业是否有更多的企业进入。本文采用以下模式进行估计：

$$entryrate_{jct} = \alpha_0 + \alpha_1 Treat_j \times Post_t + \mu_j + \lambda_t + \psi_{ct} + \omega_{kt} + \varepsilon_{ict}$$

$entryrate_{jct}$ 表示城市 c 在时间 t 时行业 j 的企业进入率，其余变量与企业进入门槛方程一致。结果如表 8 的第 (2) 列所示，受政策影响行业企业进入率提高了 0.38%，考虑到每个城市各个行业企业数量的均值为 1045.3，这表明自开增值税发票政策实施后，受政策处理行业比未受政策处理行业多 4 个企业进入。同时，我们按照“小规模企业”、“大规模企业”进行重新计算每个城市每个行业每年的企业进入率，列 (3) 表示，只用“小规模企业”的样本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受政策影响行业企业进入率提高了 0.93%，受政策处理行业比未受政策处理行业多 9.7 个企业进入。而“大规模”企业的样本回归结果不显著，证明了自开发票政策显著促进了小微企业进入市场。

表 8 企业进入

VARIABLES	(1) bus	(2) entryrate2	(3) entryrate	(4) entryrate
treat	0.0141*** (0.0039)	0.0038*** (0.0012)	0.0093*** (0.0011)	0.0003 (0.0007)
控制变量	是	否	否	否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NO	NO	NO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产业类型*年份	NO	YES	YES	YSE
Constant	0.0505*** (0.0014)	0.1205*** (0.0002)	0.1169*** (0.0002)	0.0242*** (0.0001)
Observations	162,106	145,107	144,914	131,098
R-squared	0.0156	0.6430	0.6700	0.4508

(三) 异质性分析

前文已经研究了自开发票政策对于家庭创业企业集约和扩展边际的影响, 本文通过调查企业家的特征和创业类型的特征来进一步分析自开发票政策促进了什么类型的人和创业类型进入企业, 关注企业家的三个特征, 即年龄、教育程度和性别, 创业的类型本文主要关注是否为主动创业以及创业的组织形式。

本文通过使用三个特征作为因变量来估计基准回归, 本文将受政策影响行业的企业家特征与未受政策影响行业的企业家特征进行了比较。表 9 的 (1) - (2) 列分别表示是否为高中学历以上和大学学历以上, 本文观察到学历特征和性别的系数都不显著。而年龄系数显著。这表明受到政策影响的企业家在学历特征和性别等特征没有受到影响, 而受政策影响行业的创业者比不受政策影响的创业者年龄少一岁, 可能是由于年轻人在信息交流以及政策接受方面快于年龄大的人。

如果自开发票政策真的能够降低纳税人的创业门槛, 那可能会给更多家庭带来创业激励, 主动投身创业活动 (尹志超, 2019)。如果家庭从事自营工商业的原因是“从事工商业挣得更多”、“理想爱好/想自己当老板”、“更灵活, 自由自在”, 则定义为主动创业; 如果家庭从事自营工商业的原因是“找不到其他工作机会”、“继承家业”、“社会责任, 解决就业问题”, 则定义为被动创业。表 9 的第 (5) 列因变量为是否为主动创业, 采用多值选择模型进行估计, 结果表明, 纳税征管改革显著提高了主动创业的概率。当小规模纳税人能够自行开具增值税发票, 是否会导致更加正式的经济形式出现, 本文 CHFS 问卷中“这个项目的组织形式是什么?”, 将“没有正规组织形式”定义为 1, 其余的组织形式定义为 0, 采用多值选择模型进行估计, 第 (6) 列表示显著的负向影响, 证明自开发票政策导致了更多正规组织形式的企业进入市场, 出现了更多的正规经济。

表 9 异质性分析

VARIABLES	(1)	(2)	(3)	(4)	(5)	(6)
	edu2	edu	age	gender	bus2	bus3

treat	-0.0134 (0.0223)	0.0130 (0.0125)	-0.8449* (0.4182)	-0.0277 (0.0183)	0.0106*** (0.0027)	-0.0019** (0.000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6435*** (0.0769)	0.3475*** (0.0413)	39.8084*** (2.1438)	0.4230*** (0.0567)	0.0249*** (0.0035)	0.0137*** (0.0027)
Observations	10,537	10,537	10,537	10,537	162,106	162,106
R-squared	0.3328	0.2298	0.2649	0.1290	0.0203	0.0839

七、结论与启示

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共同富裕”设立为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以及推进科技自立自强，都离不开中国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如何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是公共经济学长期关注的经典话题，也是世界各国制定经济政策市场讨论的焦点，但鲜有研究关注了纳税征管改革在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方面的作用。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增值税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在考虑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征管差异时，发现自开发票政策会提升小微企业在上游市场的竞争力，促进企业的经营绩效，进而促进更小企业进入市场，在整体呈现企业进入增加。基于上述的理论分析，本文利用2011-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及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考虑了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发票政策对于家庭创业企业的影响，本文的基线估计和稳健性检验表明，自开发票政策显著增加了小规模企业的经营绩效。本文对其潜在的机制分析发现，小规模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既有纳税监管的作用，也有真实增加了企业经营活动的作用，具体来说，自开发票政策通过减少企业纳税遵从成本，提高企业进入生产链，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三条渠道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本文还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自开发票政策导致更多受政策处理行业的企业进入市场，且进入市场的门槛降低，出现了扩展边际效应，更年轻的创业者选择主动创业。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给出以下两点政策建议：

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城市营商环境，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政务事项规范化、

制度化的处理，能够减少行政事务对小微企业的干扰。与国有等大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在代开发票等行政事务付出了更多的不必要的行政成本，“放管服”改革一方面利用信息技术更强的监管企业的生产经营，另一方面减少对于企业的打扰，极大地减少小微企业“多头跑动”的时间，实现真正的便民和服务型政府。激发中小微企业创新活力，减少政策不确定性，维持小微企业对市场的信心，鼓励和保障企业家们通过勤奋劳动和智力创新所获得公平的利润回报。

二是建立健全的税收征管体系，将增值税的链条覆盖到全部的正规经济。增值税征管从建立之初到如今，经历了飞速的发展，已经能够很好地应对低报开票收入、两方合谋、三方合谋、伪造假发票以及虚开非合理投入品的发票等众多增值税逃税模式。增值税的自我监管机制也越来越多被学界和政府所重视。随着信息化征税能力的提升，将之前账务管理能力差的小微企业纳入增值税抵扣链条，及时对下游企业的减税，也是对小微企业逃避税的监管，能够更有效率的增强税务机关的稽查管理能力。

参考文献:

- 毕青苗,陈希路,徐现祥等.行政审批改革与企业进入[J].经济研究,2018,53(02):140-155.
- 陈彪,罗鹏飞,杨金强.银税互动、融资约束与小微企业投融资[J].经济研究,2021,56(12):77-93.
- 陈钊,王旻.“营改增”是否促进了分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6,No.270(03):36-45+59.
- 樊勇,李昊楠,管淳.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间断点是否存在聚束效应[J].世界经济,2020,43(03):167-192.
- 樊勇,李昊楠.税收征管、纳税遵从与税收优惠——对金税三期工程的政策效应评估[J].财贸经济,2020,41(05):51-66.
- 范子英,彭飞.“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和分工效应:基于产业互联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7,52(02):82-95.
- 冯俊诚.减税与减负——来自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季刊),2022,22(01):67-86.
- 甘犁,秦芳,吴雨.小微企业增值税起征点提高实施效果评估——来自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数据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9,35(11):80-88+231-232.
- 孔东民,李海洋,杨薇.定向降准、贷款可得性与小微企业商业信用——基于断点回归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21,No.489(03):77-94.
- 廖福崇.审批制度改革优化了城市营商环境吗?——基于民营企业“忙里又忙外”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20,17(01):47-58+170.
- 刘冲,沙学康,张妍.交错双重差分:处理效应异质性与估计方法选择[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39(09):177-204.
- 冯海波,陆倩倩.对中小企业减税可以提高其吸纳就业能力吗——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J].税务研究,2020(10):21-28.
- 田彬彬,陶东杰,李文健.税收任务、策略性征管与企业实际税负[J].经济研究,2020,55(08):121-136.
- 田彬彬,杨健鹏,汪丹等.第三方信息获取与税收征管效率:来自有奖发票推行的证据[J].世界经济,2021,44(09):103-124.
- 杨龙见,吴斌珍,李世刚等.“以税增信”是否有助于小微企业贷款?——来自“银税互动”政策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1,56(07):96-112.
- 尹志超,公雪,郭沛瑶.移动支付对创业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证据[J].中国

-
- 工业经济,2019,No.372(03):119-137.
- 尹志超,宋全云,吴雨等.金融知识、创业决策和创业动机[J].管理世界,2015,No.256(01):87-98.
- 于文超,殷华,梁平汉.税收征管、财政压力与企业融资约束[J].中国工业经济,2018,No.358(01):100-118.
- 张克中,欧阳洁,李文健.缘何“减税难降负”:信息技术、征税能力与企业逃税[J].经济研究,2020,55(03):116-132.
- 张龙鹏,蒋为,周立群.行政审批对创业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家才能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6,No.337(04):57-74.
- 周茂,陆毅,杜艳等.开发区设立与地区制造业升级[J].中国工业经济,2018,No.360(03):62-79.
- 黄永颖,刘庆,张克中.从竞争到协调:养老保险费率统一的资本流动效应[J].经济研究,2022,57(12):162-179.
- 王伟同,李秀华,陆毅.减税激励与企业债务负担——来自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0,55(08):105-120.
- 王业斌,许雪芳.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小微企业的微观证据[J].税务研究,2019(12):16-21.
- Ali, Merima, et 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iscal capacity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evidence from Ethiopia." (2015).
- Al-Karablieh, Yazan, Evangelos Koumanakos, and Stefanie Stantcheva. "Clearing the bar: Improving tax compliance for small firms through target sett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30 (2021): 103452.
- Balde, Racky.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Small Firms' Tax Compliance in Sub-Saharan Africa*. Maastricht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 o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UNU-MERIT), 2021.
- Banerjee, Abhijit V., Timothy Besley, and Timothy W. Guinnane. "Thy neighbor's keeper: The design of a credit cooperative with theory and a tes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2 (1994): 491-515.
- Banerjee, A. V. T. Besley, and T. W. Guinnane, 1994, "The Neighbor's Keeper: The Design of a Credit Cooperative with Theory and a Tes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 491—515.
- Beck, Thorsten, and Asli Demirguc-Kunt.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s: Access to finance as a

-
- growth constraint."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11 (2006): 2931-2943.
- Beck, Thorsten, Chen Lin, and Yue Ma. "Why do firms evade taxes?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financial sector outreach." *The Journal of Finance* 69.2 (2014): 763-817.
- Bird, Richard M. "Tax challenges fac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Working Paper 9 (2008).
- Blackburn, Keith, Niloy Bose, and Salvatore Capasso. "Tax evasion,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83.2 (2012): 243-253.
- Borusyak, Kirill, Xavier Jaravel, and Jann Spiess. "Revisiting event study designs: Robust and efficient estimation." *arXiv preprint arXiv:2108.12419* (2021).
- Bu, Di, and Yin Liao. "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rural enterprise growth: Evidence from land titling reform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57 (2022): 102853.
- Carrillo, Paul, Dina Pomeranz, and Monica Singhal. "Dodging the taxman: Firm misreporting and limits to tax enforcemen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9.2 (2017): 144-164.
- Cengiz, Doruk, et al. "The effect of minimum wages on low-wage job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4.3 (2019): 1405-1454.
- Chen, Jiafeng, and Jonathan Roth. *Log-like? identified ates defined with zero-valued outcomes are (arbitrarily) scale-dependent*. Working Paper, 2022.
- De Chaisemartin, Clément, and Xavier d'Haultfoeuille. "Two-way fixed effects estimators with 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0.9 (2020): 2964-2996.
- De Paula, Aureo, and Jose A. Scheinkman. "Value-added taxes, chain effects, and informalit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4 (2010): 195-221.
- De Paula, Aureo, and Jose A. Scheinkman. "Value-added taxes, chain effects, and informalit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4 (2010): 195-221.
- Fan, Haichao, et al. "Export to elu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27 (2020): 103366.
- Fan, Haichao, et al. "The dynamic effects of computerized vat invoices on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2018).
- Gordon, Roger, and Wei Li. "Tax structur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any puzzles and a possible explana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3.7-8 (2009): 855-866.
- Harju, Jarkko, Tuomas Matikka, and Timo Rauhanen. "Compliance costs vs. tax incentives: Why do entrepreneurs respond to size-based regulatio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73 (2019): 139-

- Keen, Michael, and Joel Slemrod. "Optimal tax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52 (2017): 133-142.
- Keen, Michael. "VAT, tariffs, and withholding: Border taxes and inform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2.10-11 (2008): 1892-1906.
- Kleven, Henrik Jacobsen, et al. "Unwilling or unable to cheat? Evidence from a tax audit experiment in Denmark." *Econometrica* 79.3 (2011): 651-692.
- Kumler, Todd, Eric Verhoogen, and Judith A. Frías. *Enlisting employees in improving payroll-tax compliance: Evidence from Mexico*. No. w1938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3.
- Melitz, M. J.,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 and Aggregate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71(6): 1695-1725.
- Naritomi, Joana. "Consumers as tax audito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9 (2019): 3031-3072.
- Ouyang, Jie, Shiyuan Liu, and Haoran Li. "How doe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e affect small business tax complia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3): 101971.
- Pomeranz, Dina. "No taxation without information: Deterrence and self-enforcement in the value added tax."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8 (2015): 2539-2569.
- Slemrod, Joel, et al. "Does credit-card information reporting improve small-business tax complianc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49 (2017): 1-19.
- Sun, Liyang, and Sarah Abraham. "Estimating dynamic treatment effects in event studies with 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25.2 (2021): 175-199.
- Waseem, Mazhar. "The role of withholding in the self-enforcement of a value-added tax: Evidence from Pakista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04.2 (2022): 336-354.
- Zwick, Eric, and James Mahon. "Tax policy and heterogeneous investment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1 (2017): 217-248.